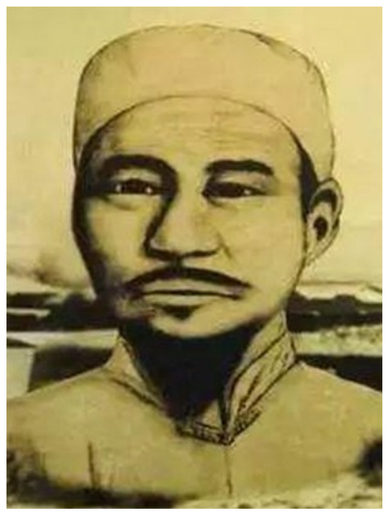
红色记忆

革命烈士马和福：为民族的解放 虽死无恨



马和福。

马和福（1893—1937年），甘肃临夏人，中共党员。1936年12月，红军在西征中于宁夏豫旺（今宁夏同心）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县级回族自治政权，马和福担任主席兼县游击大队队长。1937年2月，马和福被捕，同年4月英勇就义。

马和福，1893年出生在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一个贫苦农民家里。4岁时家乡连遭战乱和灾害，他随祖父和父母逃难到宁夏西吉县沙沟落户。没过几年，马和福的祖父和父亲因穷困潦倒先后去世。1920年海原大地震后，马和福只身投奔在宁夏豫海张家塬乡险崖子村当长工的大哥马金山，开始了他在豫旺堡一带当长工、打短工的生活。1927年，他离开豫旺堡，流浪到金积县鸿乐府给人当长工，做过皮匠、石匠、泥瓦匠、榨油匠等。

1928年，豫海县田老庄乡拓红湾村有个姓白的寡妇也带着女儿到金积县度年荒。白寡妇看到马和福为人耿直憨厚，就将16岁的女儿许配给他，招赘为婿。时年马和福已35岁，受尽苦难的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1935年，为了生计，马和福拖家带口回到豫旺堡南塬刘家岗子村居住。他出身贫苦，深知穷人的苦难，乐于帮助穷人，在穷人中具有很高的威信。1936年6月，彭德怀率领西征红军攻占了军阀马鸿逵占据的豫旺堡。许多群众因国民党的反动宣传都被吓跑了，马和福却留了下来，他想看看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在和红军的接触中，马和福见到红军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待人和善，一进村就修桥补路，照顾孤寡老人，把地主的牛羊、布匹分给穷人，废除了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在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的影响下，马和福对革命有了一定的认识。他把红军当亲人看待，主动帮助红军做事，每天跑东跑西、上山下洼作宣传，揭露敌人的谣言和哄骗，动员说服原来听信谣言逃散的乡亲们返家。在他的宣传带动下，许多群众陆续返回家园，还纷纷给红军送“欢迎粮”，捐“抗日款”，帮助红军解决吃粮吃水问题。豫海县解放后，建立了临时苏维埃政府。在一次由红军师长马青年主持召开的军民座谈会上，马和福倾诉了自己的苦难经历，表达了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决心。在红军和苏维埃政府领导同志的帮助下，他很快提高了政治觉悟。

1936年7月，马和福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积极、热情地做好参战支前工作，成为豫旺地区最为突出的优秀干部。在西征红军和陕甘宁省委的帮助下，在豫旺县西部和海原县东部地区筹建了中国第一个县级回族自治政权。1936年10月20日，马和福当选为主席。马和福任自治政府主席以后，责任更加重大，工作异常繁忙。为了更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巩固自治政权，开辟游击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他不辞劳苦，日夜奔波。自治政府成立后，他带头部署全县工作，带着自治政府文件《告白圈子四周围同胞书》，连夜赶到偏远的下流水一带开展工作。他常常在同心城、豫旺堡、王家团庄等地向群众讲演：“我们豫海地区的各族人民得到了解放，但宁夏川的劳苦大众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还要搭救宁夏的父老大众，要打到宁夏去，解放宁夏城！”他那稍带河州腔的话语，朴实无华，铿锵有力，感人肺腑。1936年11月上旬，各路红军会聚半个城（今同心），在西城外河滩举行万人军民联欢会。马和福代表豫海县各族人民致欢迎辞。他满怀激情的致辞极大地鼓舞了全场军民，会场上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在讲话中对马和福的欢迎致辞和豫海县的出色工作给予了热情赞扬。在党的领导下，马和福深入山乡，到处奔波，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动员群众；他还特别注意联系、团结和争取回族中有威望的宗教界上层人物等。他带领游击队员协助红军侦察敌情，打击不法豪绅，深入各山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宗教政策，动员妇女为红军战士捻毛线、织毛袜，发动回族乡亲筹集粮饷，先后为红军筹粮6万多斤、银圆8万多块、滩羊二毛皮和老羊皮大衣4000多件及许多布匹等支前物资。11月中旬，红军向东撤退以后，国民党军马鸿逵部很快侵占了豫海县，大搞“清党”“清红”，整个豫海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自治政府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一些在土地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投机分子纷纷叛变，投靠国民党。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马和福拒绝了组织上要他跟大部队一起撤走的要求，只要了四五条枪，在同心一带坚持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此时，在陇东边区工作的马青年受党组织委托，秘密到豫海县寻找未撤出的马和福。由于当时的环境条件所限，马青年没能及时与马和福取得联系。一天，马和福到锁家岔布置党的秘密工作，不料被反动民团头子锁有智知道了。锁有智听说马和福是共产党的县长，心想：这可是个宝贝，如果抓住了，身上一定有很多大洋（银圆），而且马鸿逵一定会重重奖赏自己。他立即带领团丁向锁家岔扑去，把马和福亲戚家围了个水泄不通。锁有智狂妄地大喊：“马和福，快投降吧！”马和福一见事情紧迫，急忙撕下半个衣服襟子包上政府大印、私章和政府机关人员花名册，塞进炕上的烟道里，然后对亲戚说：“我走不脱了。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你一定要把印章和花名册交给党。”说完，他昂首挺胸走出屋门，对团丁轻蔑地说：“我就是你们要抓的县长，不要伤及无辜。”锁有智命令团丁把马和福捆了起来，一搜身，发现他身无分文。锁有智骂道：“妈的，还以为抓了个有钱的县太爷，没想到是个穷鬼！”说完连推带搡地把马和福押到了下马关。马鸿逵听说抓到了马和福，连忙让豫旺县国民党县长屈端把马和福押解到宁夏城（今银川市），决定亲自审问这个“要犯”。马和福被押到宁夏城后，受尽了种种酷刑折磨，但他软硬不吃，只字不吐，对党忠贞不屈，大义凛然，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马鸿逵看到马和福如此顽强，也无可奈何，便气哼哼地说：“共产党的赤化政策真厉害，让群众都铁了心地跟着走。”在一无所获之后，马鸿逵决定枪毙马和福。部下请示在哪里枪毙马和福，马鸿逵咬牙切齿地说：“押到豫旺枪毙，我要让人们看看，跟着共产党走是什么样的下场！”就这样，马鸿逵命令屈端枪毙马和福。临刑前，屈端问马和福：“你还有什么话说？”马和福坦然地回答：“为民族的解放，虽死无恨。”然后他昂首挺胸走向刑场。

1937年4月3日，优秀共产党员马和福英勇就义，时年仅44岁。马和福牺牲后，马和福的儿子马兆年把父亲宁死不交给国民党的政府大印，冒着生命危险一直珍藏到新中国成立后。如今，该印陈列在宁夏博物馆。

宁夏解放后，人民政府在同心老城修建了马和福烈士陵园。1978年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之际，又将他的陵墓迁入同心新城烈士陵园。1986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开辟新址，新建烈士陵园。2008年，中共同心县委、县人民政府重修新碑，改建陵园，并将解放战争和剿匪中牺牲的21位烈士的忠骨移迁园内。如今，武警宁夏同心支队已形成一个惯例，每日早晨出操时，武警战士们都会面向烈士陵园致敬，齐声喊：“老队长早！”传承烈士的革命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这是对烈士最好的纪念。

（据中华英烈网、宁夏党史学习教育网）

红河地下党支部：山沟里的隐秘堡垒

在彭阳的山川间，红河像一条银丝带环绕着一个又一个秀美的村庄。

沿着水泥路盘山而上，经过一段砂石路，就来到了红河地下党支部旧址，这是一个隐秘在山沟梁峁间的地方。当地人说，这里叫作羊尾沟，过去交通闭塞，是个极适合隐蔽的地方，也因此成了红河地下党支部开展革命活动的主要聚集地点。

旧址所在院落坐北向南，共有9孔窑洞，正面5孔，西侧4孔。其中西侧有一孔为高窑子，要借助梯架等辅助工具才能顺利进入，这孔窑洞也是红河地下党支部经常议事的地方。走进院落正面的一孔窑洞可以清楚地看到，正对着窑洞门口的墙面上，挂着一面党旗，右手边是一个土炕，土炕上放着一张小方桌，炕边的土台上摆放着简易油灯、煮茶罐等工具，眼前仿佛浮现，为了革命、为了胜利，红河地下党支部的同志们挑灯夜战、秘密工作的场景。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对贫苦的老百姓秋毫无犯，严明的军纪、亲民的态度，让老百姓从心里认定这就是咱老百姓自己的子弟兵。半年多后，西征红军来到了这里，有了之前的基础，老百姓欢天喜地迎接红军、慰劳红军，军民情同手足。1936年年底，在红军的帮助下，红河抗日救国委员会成立，当地人王兆璜担任主任。之后，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党的活动逐渐活跃起来。1939年7 月，红河抗日救国委员会辖区内已经有中共正式党员15人。为此，中共固原县委决定正式成立红河地下党支部，王兆璜担任党支部书记。并相应成立了野王沟道、杏树湾、野王3个党小组。组长分别为杨武魁、王永清、李耀庭，每组5人。党支部采取分头活动、单线联系的方式，白天不能活动，夜间开展工作，在对敌斗争中取得的成绩卓有成效。红河地下党支部经常议事的地方在党小组组长杨武魁家里，也就是现在的旧址所在地。由于地处偏僻、隐蔽性好，加上他和儿子杨生春思想进步，诚实厚道，能够保守秘密，他家就成了红河地下党支部活动的主要地点。后来很多地下革命者到红河后，都安排在杨武魁家隐藏，杨武魁不仅免费提供食宿，还为支部活动安全提供保障。

“你看，对面河湾里有一个堡子，那是用来放哨的，一旦有什么敌情，就可以第一时间传递到这里。”站在旧址门口，红河镇红河村纪检委员王靖指着远处一座形状奇特的建筑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还是个孩子，当时王兆璜老人还在世，学校里、村里经常请老人家为我们讲历史，如何秘密开展工作，如何打仗的故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因为所辖范围在敌占区，红河地下党支部一直在开展秘密斗争，到解放战争开始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为了粉碎敌人的疯狂进攻，党支部采取了更加积极、灵活、有效的斗争方式，不断吸收思想进步人员，扩大革命阵营，及时准确掌握敌人动向，挫败了敌人很多次有预谋的破坏活动。到1948年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上级党组织要求红河地下党支部积极发动群众，壮大队伍力量。到1949年，党支部组建起一支60多人的游击队，由此对敌斗争逐步从地下转为半公开，与当地国民党的政权基本处于对峙状态。

1949年8月，红河党支部走上了崭新的革命和建设历程，这时党支部已有中共正式党员50多人。此后，这一批久经考验的同志都积极参与和负责当地政治和经济建设。

红河地下党支部的成立，从秘密开展工作到队伍不断壮大，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时11年之久。这是一支宁夏农村唯一坚持开展革命活动直到全国解放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为陕甘宁边区革命斗争史谱写了一曲壮丽的乐章。

如今，红河流域成了彭阳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排头兵，设施农业、林果经济、生态建设、流域治理等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也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感受红色历史，回首峥嵘岁月的精神高地。 （据固原党史网）

西征战役

1936年5月5日，红一方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但是，蒋介石坚持内战政策，拒绝议和，并调集16个师另3个旅准备对陕甘苏区发动新的“进剿”。其中宁夏第15路军司令马鸿逵以其新编第7师一部驻守定边、盐池、豫旺等地；第35师（师长马鸿宾）驻守庆阳、曲子、环县、镇原地区，防堵红军西进。中革军委为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壮大红军，努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实现全国性的对日抗战的任务，于18日下达《西征战役计划》，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1、第15军团和第81师等部共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打击宁夏“二马”，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创建新苏区；以红军第29、第30军和地方武装、陕北游击队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牵制国民党军，保卫陕甘苏区，策应西征作战。

5月19日和20日，西方野战军分左右两路相继从延长、延川地区出发西进。红1军团为左路军，经蟠龙、安塞到达吴起镇集结；红15军团为右路军，经永坪、蟠龙之间到达靖边新城堡集结；野战军直属队和红81师随红15军团跟进。彭德怀根据敌人布防态势，决心以右路军首先向西北方向发起进攻，伪装进攻宁夏（今银川），调动环县、庆阳之第35师回援宁夏，以左路军寻歼回援之敌于运动中。27日，右路军红15军团西进，红73师袭占宁条梁，红78师围困安边，主力转向定边以南地区。28日，左路军红1军团从吴起镇出发，30日前陆续到达元城镇地区。6月1日，红2师在曲子歼敌第35师骑兵团一部，追敌第105旅旅长冶成章和特务连投降；红4师在马岭附近击溃敌第35师1个营。3日，红1军团主力在阜城歼驰援之敌第35师6个步兵营，击溃2个骑兵营。至5日，红1军团主力乘胜占领了环县、洪德城、三岔地区，13日进到七营附近。红15军团于6月4日进占红柳沟。至11日，其先头部队占领同心城，主力进到王家团庄附近。14日，红28军编入西方野战军序列，与红81师等部组成中路军（又称北路军），后接替右路军围攻安边，夺取定边、堆子梁等城寨的任务。在此期间，红29军1个团也进至元城、曲子、阜城地区，配合左路军行动。至此，红军占领七营、王家团庄，切断了第35师北上道路，迫敌退回固原的黑城镇地区。

6月中下旬，右路军在中路军配合下，相继攻占定边、盐池、豫旺县城，歼敌新编第7师骑兵2个多营，击溃3个团又2个营；左路军攻占豫旺堡。7月间，西方野战军在红城水、安边、七营等地击退敌人的数次反扑和袭扰，巩固和扩大了占领区，新老苏区连成一片。红军在新开辟地区发动群众，扩充兵员，征集资财，并对东北军部队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东线红军和地方武装、游击队，疲惫和迟滞了国民党军，有力地配合了西方野战军的作战。7月底，西方野战军主力集结在豫旺地区休整，战役结束。

西征战役历时两个多月，共歼敌7个营，击溃敌3个团又5个营，俘敌2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战马500余匹，占领城镇10余座，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开辟纵横200余公里的新区，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起了积极作用。（据新华社）

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抗日斗争的领导中枢

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之一，是经国共两党签订协议共同承认的“特区”。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于1937年9月，首府为延安。陕甘宁边区是中共抗日斗争的出发点，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我们党领导全国抗日战争的中枢。

人才的“摇篮”——中共抗日干部的培养

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陕甘宁边区改革旧有的教育体制，推行“干部教育重于社会教育”的独特教育体制，积极进行抗日干部的培养，成为中共抗日干部的“摇篮”。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在陕甘宁边区除加强原有的干部教育外，还开办了许多中高级干部学校。边区成为中共抗日干部的大熔炉，来自全国各地的抗日志士，在边区培训后又走向全国抗日战场，源源不断地为敌后抗日根据地输送着各类干部人才。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即已设立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其中，中央党校是抗战时期专门负责培养中共中高级领导干部的学校，而“抗大”作为中共中央创办的最高军事学府，仅在陕北三年多就培养学员1.5余人，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批军事干部。

值得注意的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陆续在陕甘宁边区创办了一系列干部学校，主要有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等。其中，陕北公学是最早创办的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干部的学校，如毛泽东所说“陕北公学主要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的任务”。至1941年8月并入延安大学时，陕北公学已经先后培养学员1万多人。整个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为前线输送了10多万抗日干部，大多数分配到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工作，成为中共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

“遥控”抗战——敌后战场的指挥中心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居于特殊而重要的战略地位，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和抗战的指挥堡垒，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由于陕甘宁边区始终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中，中共中央能在这里集中研究和解决抗日战争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将各项决策传达到各个抗日根据地。

正是在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制定了指导抗战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政策，毛泽东写了大量有关抗日战争的著作，如抗战伊始中共中央即召开洛川会议，制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开辟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就是从陕甘宁边区出发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并成功创建了各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提出了中共领导的人民战争路线，成为指导抗日战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

同时，中央军委在陕甘宁边区也制定了无数的作战指示和命令。军委总政治部的成立缘于对全军政治工作统一领导的需要。1938年2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决定“前后方及南方各游击区部队的政治工作，统归军委政治部领导。为统一对外名义，军委政治部以八路军政治部名义出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既是中央军委的政治工作部门和全军的政治工作最高领导机构，又是中共中央负责军队党的工作的机关，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成为敌后战场的指挥中心可见一斑。

抗日的“灯塔”——抗战思想文化的传播

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共领导全国抗战思想和文化的中心，中共中央在边区制定的思想方针、文化政策指导和影响着全国。全面抗战以来，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聚集到陕甘宁边区，投身抗日战争，形成一支阵容可观的抗战文化队伍。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不仅有新华通讯社、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印刷厂、新华书店等新闻出版团体，还有《解放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共产党人》《中国文化》《边区群众报》《抗战生活》等重要报刊，能够让全国各地及时聆听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有力地宣传了中共的抗战思想。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即成立了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包括国防教育研究会、战歌社、海燕社、抗战文艺工作团、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文艺突击社等众多文化团体。在中共的领导下，这支抗战文化队伍坚持为工农服务的方向，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特别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抗战时期中共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根本性理论和政策问题，强调文化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随着抗战的发展，文化团体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边区分会、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等先后成立，这些文化团体通过组织创作、观摩演出、举办展览、开办讲座等文艺活动，宣传抗日思想，传播抗战文化。陕甘宁边区还涌现出许多文艺社团，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抗战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烽火剧团、边保剧团等，创造了戏剧《兄妹开荒》《白毛女》，诗歌《边区自卫军》《平汉工人破坏大队》，音乐《南泥湾》《八路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一大批民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有力地促进了抗战文艺的发展，推动了中共抗战思想文化的传播。

根据地的“试验区”——边区的示范作用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共中央许多关于政治、经济重大方针和决策的试验区，并作为示范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推广，正如毛泽东所言“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

陕甘宁边区是抗战时期第一个实行民主制度的区域，是中共民主建设的示范区。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后，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开始了第一次民主普选运动，进行了乡、县和边区三级的民主选举。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正式召开，标志着中共真正建成了民主制度的试验区。朱德曾谈到“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至1941年陕甘宁边区进行了第二次民主选举，并在参议会和政府中贯彻了“三三制”原则，标志着抗日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民主制度的建设和试验，为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设提供了经验，树立了典范。

陕甘宁边区也是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模范区，这是由其特殊而重要的政治地位所决定的。随着抗日战事的发展，在陕甘宁边区遇到极大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陕甘宁边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成为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示范和典型，毛泽东称赞其“成了全国的模范”。大生产运动的成功经验由边区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新民主主义纲领和政策都是先在陕甘宁边区试行，然后再在其他抗日根据地进行推广，所以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试验区”。毛泽东曾在1938年指出“边区的作用，就在于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1940年他又讲到“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 （据《光明日报》）